

QIANZHONGSHU20SHIJIDERENWENBEIGE

当代中国最受瞩目的文化大师

钱钟书

20世纪的

上卷



人文悲歌

刘中国/著

花城出版社

自序

这本书从武汉写到深圳，断断续续写了多年。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我一直谨记钱钟书先生的诲训：

记得诺娃利史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每一个人的传记应当是一部 Bible(圣经)。”喜欢做警句的人大可套著调来一句：“每一个思想家的自传应当是一部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独特的心灵史)。”这种自传最为难写。我们须要捉住心的变动不居，看它在追求，在创化，在生息，然后我们把这个心的“天路历程”委曲详尽地传达出来；在文笔一方面，不能太抽象，在实质一方面，不宜与我们的专著相犯，因为自传的要点在于描写，不在于解释，侧重在思想的微茫的来源，不在思想的正确理由。

遗憾的是，我自觉远没有达到他提出的这个传记文学标准。虽然我可以像某些作者那样声明，本人与传主有过通信或交谈，对于从传主的亲属、师友、门生处收集的资料，对于报章披露的回忆、采访文章，都一一准情酌理，旁稽参校，务求其真实可靠，甚或印出与传主的合影和来往信件招徕读者等等——我以为这是没有必要的。

这本书就摆在你面前，像无法销毁的罪证，它将把我的盲目无知揭发无遗。好在钱钟书先生早就有言在先：“盲目无知

往往是勇气的源泉。”我可以现成借来包羞遮丑。但在本书撰写和修改的过程中，至少我力图做到这一点：尊重知识，敬仰美德，忠于历史。我当然知道，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道很难逾越的鸿沟。书中错误或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996 年暮春

拙书出版日期推迟，使我有时间订正疏漏。奈何公务猬集，身心疲惫。老友陈少鹏、邱衍云、蒋坚骅诸君索取清样，代为匡谬，本书责编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此深谢。

1998 年初夏又记

目 录

| | |
|---|--------|
| 自 序 | (1) |
| 引 子 | (3) |
| 第一章 太湖无垠 奇石嶙峋钟神秀 | (9) |
| 1910年11月21日,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教书匠世家。晚年被推崇为泰山北斗之际,他只清楚地记得自己不过是一个清贫教师家的孩子。 | |
| 第二章 痴颠顽童 一般如梦欠分明 | (39) |
| 民国初年,“大总统”换得像走马灯,大有“总统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势头。伯父曾想把钱钟书培养成民国“大总统”,父亲只想教他好好读书。痴颠顽童吃尽了皮肉之苦,直到发现了《林译小说丛书》,才发愤学外语——为的是有一天能读原文。 | |
| 第三章 初来清华 除却摊书只忆家 | (69) |
| 德国一个神学家说:“我们第一次出生自子 | |

宫，也是来自安全之乡，‘故乡’则是另外一个‘子宫’，是人们长大成人的地方。孩提时代是我们感到最安全的岁月，人们怀着浪漫色彩并且伤感地怀念那个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钱钟书不断地习惯于一个个陌生的地方，学会在噪音的包围中深思默存。

第四章 允执厥中 兔窟三营莫守株 …… (89)

身处西洋文化氛围浓郁的清华园，钱钟书并没有被洋风吹得东倒西歪，而是亲炙中西圣哲，不遗时贤，涵泳古今，允执厥中，亦中亦西，亦古亦今，兔窟三营。

第五章 雅趣深隽 淋漓难得笔如椽 … (121)

内乱方殷，外患剧增。在那样一个时代大氛围下，钱钟书迎来了第一个创作、研究高潮。张申府对他发表在《清华周刊》、《大公报》、《新月》等报刊上的一系列书评的评语是——雅趣深隽。

第六章 年少轻别 梦魂相逐天涯去 … (151)

和杨绛的婚恋，使钱钟书成为一个“积极而又充满活力的 happily - married man”。大学毕业后的两年，他却尝够了相思之苦——刊布在《国风》半月刊的一系列风华绮丽的爱情诗作，就是“思想放假”的产物。

第七章 初为人师 西风掺雨恼人声 … (175)

从大学到大学，翩翩少年，登坛说法，举座皆惊；与旧雨新知唱和，诗情泉涌。但那根与清华园连在一起的脐带，暂时还未割断——更何况杨绛正在校园里一条条横的、直的、曲折的道路上“收脚印”……

第八章 独行开径 气胜苏黄振国风 … (205)

“舌耕”生涯无法榨干钱钟书充沛的精力。恰恰相反，这段时间，他诗情勃发，文思泉涌，在创作、研究两条道上突飞猛进。

第九章 风气煽荡 湖海飘姚有夙心 … (231)

钱钟书的“血地”无锡，素受“西风”吹拂，得风气之先；他求学的清华园，多有留学欧美、学贯中西的大师巨擘；何况他自己“未甘闾里竟浮沉，湖海飘姚有夙心”！

第十章 留学泰西 敢乐他乡忘故乡 … (253)

留学欧洲，钱钟书夫妇双双获得副博士学位。就在他们做论文期间，爱女钱瑗出生。这两位建造巴比伦塔的智者，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痴”，家国之念、忧患之思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第十一章 木坏山颓 明发沧波望渺然

(281)

“试问随风归底处，江南黄叶已无村”。在烽火连天的1938年，钱钟书挈妇将雏，万里归国，为灾难深重的祖国效命。舟中与冒效鲁的以诗定交，对他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巨大影响。

第十二章 昆明舍馆 双飞归燕不双栖

(301)

赁居“冷屋”，狷狂不羁。“冷屋随笔”使多少人股颤心寒？某些昔年师长大有“小子鸣鼓而击之”的愤慨。“如此风光偏失侣，无多土地许衔泥”，他念念不忘的是国难当头之际亲人的安危。

第十三章 湘西山中 开卷愁无记事珠

(329)

困居湘西穷山中，钱钟书过了两年悄焉寡侣的凄苦生活。青灯黄卷，逸兴遄飞，咳唾珠玉，窗外几竿瘦竹，“高材直节伴羁孤”，国难离愁使他“生知愁是赋诗资”。

第十四章 春申江畔 偷生坯户待惊雷

(369)

郑振铎在“孤岛”上宣称：“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就是这团

浩然之气，使得“孤岛”上的艺术家偷生坯户，等待惊雷，拚死拚活捍卫思想的尊严和人格的纯净。

第十五章 托命围城 梦入红楼第几层

(389)

“黄金时代”也许是诡计多端的“教主”编撰的谎言。“吾世”难现，“故乡”难觅，钱钟书托命围城，在“现世”、“他乡”开始了一段漫长、凄苦而又悲壮的生命之旅。

第十六章 倭寇面北 旧邦更始得新命

(417)

战后最强烈的呼声是“民主”、“自由”与“和平”。春申江畔，人们一边陶醉于“旧邦更始得新命”的狂欢中，一边力阻战神的翅膀再次腾空而起，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得到空前的呈现。

第十七章 翰墨伏波 伤歧前路小退回

(439)

素来不喜交际的钱钟书，战后那几年频频出现在文人雅士相聚的场合。除了担任暨南大学教授，还有众多兼职，照他的话说，“兼差之多，提不胜提，不如不提”。

第十八章 围城重重 偶然欲作最能工

(459)

“围城”是所谓时新的老古货。《围城》的创作和出版，把“围城”一词刮垢磨光，使之传导出意味深长的思辨魅力——“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第十九章 京华憔悴 沉舟犹恐触千帆

(487)

“改造”是个建国初年叫得很响亮的词儿。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水木清华虽然“名园北监仍多士”，但是“桃观已非前度树”——“洗澡运动”中，多少人被“洗”得体无完肤、失魂落魄！

第二十章 容安室主 万人海里一身藏

(521)

“不能自立，犹如酥油委地。”在一个人人争先恐后表现“先进”的年代，钱钟书却渴慕庄子的所谓“陆沉”，向往着陶潜的“归隐”，遂为书斋取名“容安室”——鞭影闪闪，驴踏陈迹；容安室主，此何以堪？

第二十一章 憋雷隐隐 啼鸠忽隙雨将来

(545)

“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的结

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段话是对 1957 年的“鸣放”运动最好的揭示。钱钟书“默存”过这场运动，他的众多亲友却被打成了“极右”、“右派”、“中右”分子……

第二十二章 动辄得咎 小诗凄切作秋声

..... (569)

1958 年 ~ 1959 年是个热昏的年头，到处都在“插红旗”、“拔白旗”、“放卫星”。钱钟书继 1948 年后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围攻高潮掀起前夕，他被下放昌黎捣粪，真可谓“手散黄金成粪土，天将大任予曹刘”！

第二十三章 怀远伤高 毁出求全辨不宜

..... (591)

生存的空间日逐逼仄，人们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是，钱钟书的脚跟早已立定，道路早已选择——尽管大教堂的屋顶上吹着东南西北风，教堂的尖顶仍然在烈日和暴风雨中昂然挺立。

第二十四章 丙午丁未 京华多少憔悴人

..... (611)

“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左爷”的

狂欢节。剃了和尚头、戴了高帽子、挂了黑牌子的钱钟书，望了一眼剃光半个头的杨绛，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爱丽丝漫游仙境记》——“Curiouser and Curiouser！”

第二十五章 流放豫南 严霜烈日惯曾经

(643)

接受折磨，就叫“锻炼”。最经折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在豫南流放地，钱钟书从事过司炉、保管员、邮差等职业，杨绛则是种菜——九蒸九焙的结果竟然是：“我还是依然故我。”

第二十六章 鬓青头白 四劫三灾次第过

(679)

钱钟书夫妇从广阔天地归来，居无定所，却在暗自庆幸：“四劫三灾次第过”，并且祈望着有那么一天，能够和历经磨难的友人“共拨寒灰活劫灰”。在赁居的办公室里，他们以衰病之躯创造了各自的“神话”。

第二十七章 锥指管窥 此心忍死最堪哀

(703)

《管锥编》上窥百代、兼综欧亚，衡文造艺之际，矛头直指法西斯主义文化专制。钱钟书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精神，在这部皇皇巨著中表

露无遗。

第二十八章 自西徂东 一代宗师惊海外

..... (721)

钱钟书虽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遗忘”了，但他的著述并未进入“忘川”。正像美国的爱伦·坡、福克纳在欧洲受到激赏才被本国文坛重新接受一样，欧美学者对《围城》、《谈艺录》、《管锥编》的“发现”或“发明”，使得钱钟书由“出口”转“内销”。

第二十九章 软红尘里 落索声名免谤增

..... (751)

苏东坡说“惟有皇城真堪隐，万人海里一身藏”。钱钟书说“凋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增”——软红尘里，钱钟书夫妇对“功名利禄”可谓“四大皆空”，只想各披一件“隐身衣”，同出遨游或在书中“串门儿”。

第三十章 钱文改公 语不惊人死不休

..... (785)

对于钱钟书和他的工作而言，所谓时间的流逝，只是过眼幻影。时间一点也没逝去，就像梵天脑中闪过的思想立刻就点燃了凡人脑中的火绒一样。他的人格纯粹，他的材料纯粹，他的艺术纯粹，结果怎能不神奇？

第十六章

倭寇面北 旧邦更始得新命

战后最强烈的呼声是“民主”、“自由”与“和平”。春申江畔，人们一边陶醉于“旧邦更始得新命”的狂欢中，一边力阻战神的翅膀再次腾空而起，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得到空前的呈现。

钱钟书如是说

那时候，我们的世界已经给科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训练得驯服，沿着创化论、进化论、层化论、优生学、“新生活运动”的规律，日新月异。……这个充满了物质的世界同时也很空虚，宛如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愚人的头脑。

——《上帝的梦》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陈寅恪《乙酉八月十一日
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鉴于侵略战争失败的命运无可挽回，拟定了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正式照会。照会以电报的形式，发往日本驻伯尔尼和斯德哥尔摩大使馆，从那里转发到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和重庆：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由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在波茨坦发表的、后由苏联政府参加签署的联合声明所提出的所有条款，如果该声明不包括任何有损于天皇陛下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特权的要求。

8月11日，美国国务卿代表中、美、苏、英4国政府答复日本，接受其投降请求。

8月15日，驻重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接到日本致中、美、苏、英4国的投降电文。

日本投降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万家爆竹通宵，人类祥光乍绕。百壶且试开怀抱，镜里髯翁不老”（于右任《闻日本乞降》）。郑振铎在8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和平’已实现矣！今后当可安生乐业，不愁饥寒了！”

60年代末70年代初，钱钟书在豫南干校不止一次听当地农民谈及小日本投降那年，淮河两岸竹子开花。他有良多感触，按照豫南乡下的迷信说法：小日本投降竹子开花，那叫苍天有眼；同时，竹子开花也预示着又一场灾难的逼近。

“胜利了！我们胜利了！”青天白日旗满街飘扬，游行的队伍川流不息。西装革履的钱钟书走上街头，日伪当局发放的“居民证”，早被他揉成一团，丢进了垃圾堆。

到处是聚在一起的人群！到处是激动的交谈！人们倾囊买醉，狂欢通宵……

多少人期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多少人向往着幸福、和平的生活！

多少人向往着和分别已久的亲朋团聚！多少人没有盼到这一天！

多少人倒毙在流徙途中或殒命于日寇的刺刀之下！

多少人血染强寇、战死疆场……

但是，蒋介石在为日本投降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说中却说：勉国人于胜利后，勿骄勿怠，努力建设；不念旧恶，勿对日本人报复！

钱钟书买了几份号外，回到寓所，一目十行地读完日本正式投降的经过。这些内容，他在傅雷客厅里的一次次闲谈中早有听闻。

电话不断，朋友们相互庆贺：“中州无外皆同壤，旧命维新

岂陋邦！”

“孤岛”淹没的几年里，日寇“不容灯火尽情明，禁绝千家爆竹声”。而在“鹤唳”（在日本，圣旨被称为“鹤唳”，鹤是帝王的象征；8月15日上午，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御音”广播颁布停战诏书）之后，昔日横行霸道的日本侵略者，十分不情愿地垂下了脑壳，太阳旗纷纷降下、卷起。

爆竹声通宵达旦。灯火管制终于取消了。曾经漆黑一团的上海，又成了名副其实的“不夜城”。

飞扬跋扈的侵略者不再吼叫《拔刀队》。他们龟缩在一角，悄悄地把战刀插进刀鞘，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圣战”就这么不光彩地结束了么？这莫非是一场梦魇？

可惜，这不是一场梦魇！这是刺刀和枪弹都抵挡不住的事实：大日本帝国战败了！

此时此刻，侵略者一边祈盼回到家园，一边无限感伤地聆听着《君之代》。

曾几何时，剑之锋血光闪闪，中国人是他们练习枪法的活靶子！多少无辜者在他们的刀枪下丧生！

多少“东亚病夫”成了他们试验新式武器的牺牲品！

现在，今非昔比，他们开始哀怨帝国的末日，开始为黯然失色的命运浊泪空弹。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许，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至此，日本战败投降被载入史册，国民党政府决定把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日。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斗争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

1945年9月9日上午，六朝古都南京天气晴朗。在黄埔路尽头的军校礼堂，日本在华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向